

## 关于翻译研究共识问题的思考

邓海丽, 李德超

(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106;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摘要:**由翻译学者 Chesterman 和 Arrojo 在本世纪初发起的翻译研究需不需要共识的讨论对整个译界的影响很大。本文分析了这次讨论的主要观点和相应的批评,认为在现阶段寻求翻译共识并无助于促进翻译学科的发展,反而有碍于翻译研究发出多元化的声音。

**关键词:** 翻译研究; 共识;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1)06-0104-05

**Abstract:** The debate on shared groun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itiated by Chesterman and Arroj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s still exerting influence on the self-reflexiv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oday. The paper reviews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views covered in the debate and argues that it is not desirable for us to seek common ground at the current stage as it will create artificial and rigid boundaries and discourage the diversity of views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shared ground; diversity

### 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翻译研究摆脱以前那种规定性(prescriptive)研究方法以来,新的研究模式和研究角度层出不穷。有的强调翻译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如早期以 Bassnett 和 Lefevere 为领军人物的文化学派),有的强调从目标语系统出发,研究译文在目标语政治、文化、语言和文学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如 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及 Toury 对翻译规范的研究),有的强调从翻译活动的目的(来自客户或是译者)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形成的作用(如 Reiss, Vermeer 和 Nord 倡导的目的论),有的则讨论译者在翻译中的位置以及翻译体现的文化输入及输出失衡问题(如 Venuti 的归化及异化理论以及 Arrojo 等人倡导的后殖民翻译理论等),有的则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一系列的翻译行为,包括选材、具体操作、作品影响等(如 Gutt 运用关联理论来解释翻译)和最近比较流行的从认知文体学角度解释翻译(如 Boase-Beier 新翻译文体学理论)(黄立波 2009: 104),不一而足。这些研究取向颠覆了几百年来认为翻译仅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机械性、简单化观点,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翻译大千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鉴于当今翻译研究流派种类繁多,有学者尝试归纳出各流派学说的一些共同认可的观点,以概括译学研究二十余年来的进展,寻求将翻译研究规范化、系统化。这方面最具有影响的莫过于 Chesterman 和 Arrojo 十年前发起的寻求翻译研究“共识”(shared ground)的讨论。直至今日,“共识”问题在翻译界仍然余波未了,争论不休(参见

Olohan 2004: 5-9; Tennent 2005: xviii-xx, etc.)。

### 2. 翻译研究“共识”的提出

翻译研究“共识”的讨论由 Chesterman 和 Arrojo 最早在2000年 *Target* 杂志以一篇论点总结的形式提出。随后,来自全世界的不少翻译学者对这些“共识”各抒己见,在国际翻译界引起广泛的争论。

Chesterman 和 Arrojo 虽然是共同提出这个论题,但究其学术背景,这两位学者对翻译研究的基本主张其实向来是南辕北辙。前者主张从实验性和描述性的角度考察翻译;后者提倡从后现代文化学(postmodern cultural studies)和语篇理论(textual theories)的维度来审视翻译。尽管双方的翻译研究理念大相径庭,但都想弄明白彼此之间有无契合点。表面上看,他们的动机有二:一是通过这种“求同存异”的方式找出当代翻译研究迄今取得的一些为大部分研究者公认的成就;二是通过找出这些契合之处来说明各流派的翻译研究之间(如所谓的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等)并非是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归纳的共识(如得到广泛认可的话)将会成为沟通各个流派的重要桥梁,从而避免各流派之间无建设性的攻讦,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为此,这两位学者精心讨论总结了30条论点(thesis)形式的“共识”,大致围绕1)“什么是翻译?”(14条);2)“为什么会有这种翻译?”(7条);3)“翻译带来什么结果?”(9条)展开。由于翻译活动离不开语言的意义,他们事先区分两种不同的“意义”观“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非本质主义”(non-essentialism)。前者认为“意义

是客观的、稳定的;译者的任务就是发掘和传递这种意义,为此,译者应尽可能隐身”;而后者认为“意义……固有特点即为不稳定性,它在每个不同的场合中都需要阐释,因此译者难免要现身”(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1)。两位学者认为,“本质主义”意义观为实证翻译研究的基石,而“非本质主义”意义观则为后现代翻译研究之本。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第一部分提出了对翻译研究的总的看法,认为翻译研究的目的是“了解翻译现象,无论这种现象的定义及实践如何”(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1)。比如,“英文 translation 一词所指并不一定与其它语言中指翻译的词(如德语 Übersetzung)意义一样。翻译研究的兴趣在于描绘出这些不同的概念,发现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2)。他们提出采用“原型论”(prototype theory)来看待翻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译作”,将其定义为“在特定文化和特定时间内大部分被人们认可为翻译的那些文本”(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3)。翻译研究除了要发现符合主流翻译定义的译作的特征外,还要归纳翻译性质存异的文本(如“伪译”)“在特定文化中的特点及导致这些特点的原因”(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3)。在这部分提及的还有“译者”、“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翻译的比喻”(metaphors of translation)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等。

第二部分提到解释翻译现象的重要性,强调要从多个层面寻求特定翻译行为的原因,如可以从“译者的个性、性别、认知水平、个人经验、决定过程、委托人的影响、翻译目的、翻译情况的特点、原文、原语和译语、隐含读者、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道德上的考量等等”(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4)。同时,他们认为,翻译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必然会有某些共通的地方。换言之,“翻译行为具有特定的模式,表现为译作中可观察到的模式”研究者可以根据在具体条件中观察到的这些翻译模式的规律性(regularities)作出论断,论断形式为“在某种条件下,译者似乎常做某事”或“在某种条件下,译作似乎常呈现出这些特点”等(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5)。

第三部分论述翻译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宏观的影响(如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影响),还包括微观的影响(如对读者的“精神状态”和“阅读之后的行为”)(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5-156)。这里的影响还包括读者对译作的批评,比如在处理具体翻译问题(如文化意象、方言等)提出的规定性的方法。他们认为这些言论都应归入对翻译的论述(discourse on translation),是翻译研究的对象之一。“道德”(ethics)也是研究翻译影响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它能让我们知道“在何种意义上翻译或翻译决策可带来‘良好’影响”(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4)。

### 3. 对翻译研究“共识”的讨论

总体而言,这30条“共识”力图呈现当代翻译研究主要流派讨论的一些热点,如翻译规范、翻译目的、译者的作用、翻译道德等问题。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译学研究的进展,但这些“共识”是一个概括了主要流派观点的客观的总结,还是一个带有个人研究倾向的概述?

仔细研究这30条论断,我们会发现,这些“共识”对不同翻译流派观点的采纳明显有不同的侧重。这令人怀疑 Chesterman 和 Arrojo 在一开始立论时,并非对所有的理论观点一视同仁。例如,“共识”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以 Toury, Hermans 及 Chesterman 为首的一批学者倡导的描述翻译研究正在研究或认为应该研究的内容,如强调研究翻译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研究译者发表的关于翻译的议论、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以及种种解释翻译现象的途径以至于对翻译活动规律特点的总结和陈述等等。这些均与描述翻译研究的研究立场、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目的一脉相承。考虑到 Chesterman 深厚的描述翻译研究的背景,这难免令人觉得这些所谓的“共识”有一种厚此薄彼、打着“共识”的观点而为描述翻译学摇旗呐喊之嫌。

除此之外,这些“共识”内容芜杂,许多论点各自为政,除主要论及描述翻译研究的观点外,还涉及不少翻译研究的其它方面。虽然“共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但其中包括的某些内容并非完全能由这些主题所涵盖。比如,在第一部分还提到了翻译类型学的建立、翻译质量和翻译评估等问题,这些归到“什么是翻译”主题之下似乎有些牵强。有些“共识”讨论的角度颇为宏观、抽象(如什么是“翻译”),而有些则非常微观,类似随感式的经验总结,如第27条“部分读者(如教师或评论员)因受薪关系,才作出特定反应,故他们非典型读者”(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155)。而有的“共识”更有同义反复之嫌(如第20条与第21条对翻译行为模式的论述)。笔者推测 Chesterman 和 Arrojo 的原意是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挖掘有关翻译研究的一些共同点,无论各个观点的概括力(generalizability)的大小。但这样一来,这30条共识有如散落一地的珍珠,缺乏贯穿的主线,给人以缺乏内在联系之感。

除了论点带有偏见和归纳结构上的“硬伤”之外,世界各地的学者亦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内容繁杂的“共识”提出质询。囿于篇幅,本文只能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就是“共识”中对意义的“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区分。Simeoni (2000: 337)认为,这两种意义观并非相互排斥的。并非所有的从事描写翻译学的学者都认为意义是稳定的。同样,也有不少从事后现代翻译研究学者亦采纳实证研究。如果无视

对方的意义观和研究热点,这些学者的研究就都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地步”(Chesterman and Arrojo 2000: 338)。Sela-Sheffy 和 Gile 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认为意义是稳定和客观的观点,充其量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看法,并非主流意见。把它作为实证翻译研究的立论基础并不妥当(Sela-Sheffy 2000: 346; Gile 2001: 150)。Malmkjar (2000: 342) 追溯了“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历史渊源,指出无论是从哲学还是从种种针对单语或多语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 Chesterman 所说的“意义是客观的、稳定的”的“本质主义”意义观均站不住脚。对此, Malmkjar 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她一方面认为意义随语境而变,另一方面则又强调某些意义比其它意义更具有稳定性,试图调和这两种意义观。

“共识”中对“翻译的比喻”着墨甚多,认为形形色色的关于翻译的比喻(如“翻译是食人行为”、“翻译是表演”等)能揭示特定文化、特定时期对翻译的定义。但 Halverson (2000) 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她从认知隐喻学(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的角度出发,认为所有的比喻从深层来看反映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并非仅是其语言外壳所指。因此,尽管有关翻译的比喻有很多,其概念结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翻译就是转移”(Translation is transfer) (Halverson 2000: 359)。换言之,不同的翻译比喻并不能告诉我们翻译概念在本质上的变迁,因为起到上述比喻基础作用的概念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对翻译这个概念最基本的理解亦没有变化”(Halverson 2000: 360)。

另外,还有不少来自不同研究背景(如文学、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都纷纷基于自身的理论关注和研究目的,对这些“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例如,社会学训练出身的 Pym 虽然承认不同流派的翻译学者有互相沟通的必要,但他认为寻求“共识”根本就不是翻译研究的目标,因为一门学科可以“包括所有具有潜在兴趣的研究,或是包括某些人不感兴趣的研究”(Pym 2000: 336)。他继而认为,与其提出一些不需要存在的共识,倒不如提出一些必须在翻译研究中解决的问题来得实在,如提出“用于辅助专门领域翻译的文本类型理论”、找到“种种训练译员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像人那样工作,而非像机器般工作”等等(Pym 2000: 336)。质疑“共识”目的和作用的还有来自加拿大政府翻译部门的 Brian Mossop。他指出, Chesterman 和 Arrojo 一开始就没有说明寻求“共识”为什么对翻译研究重要,亦怀疑有了“共识”就可以加快翻译研究发展的说法(2001: 159)。他认为,归根到底,促进翻译学科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诱因——即翻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缘故。

来自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 Sela-Sheffy (2000: 346) 认为,这些“共识”打上了浓重的文学思维的记印,且大部分都脱离不了“局限的、以文本为中心角度”的框框,而没有尝试建立一个“全面的、以文化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方法”。

在她看来,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探讨翻译在文化建构、文化接受或文化阻抗中起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翻译是“研究普遍的文化动能(不仅仅是语言行为)的一个完美的试验场所”(Sela-Sheffy 2000: 348)。虽然有部分“共识”提及要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解释翻译描写的结果,但 Sela-Sheffy 却认为它们不是过于空洞就是过于简单化(如“共识”第8条提出的要从“整个社会”角度研究翻译),充其量只是个“近似的社会学解释模式”(quasi-sociological explanatory model)。

还有其它的学者针对“共识”的其它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 Gentzler (2001: 161) 认为,太过强调研究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中的“规范”(norm)“可能并不足以反映不断扩展的翻译研究的版图”; Shlesinger (2001: 166) 则指出,由于口译的独特研究性质,有相当大部分的“共识”并不适用于口译研究,如在口译中,译者绝不可能隐身,且口译中的意义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特点。同样一句话在不同场合、不同语气、不同说话者的演绎下,口译起来可能差别非常大。Tirkkonen-Condit (et al) (2001: 341) 用 TAPs 方法探讨人类大脑中的翻译过程多年,他们认为,实证翻译研究要做描写和概括,而不是用来预测“别的研究者在其它翻译中能否发现类似的现象”。

#### 4. 翻译研究有无必要达成“共识”?

在“共识”的讨论中, Chesterman 和 Arrojo 的另一个重要隐含意图就是要总结出翻译研究最主要的特点和性质,确定其本质上的特征,让翻译与其它学科,尤其是相邻近的学科,如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文化研究、交际学、信息学等,互相区分。他们的这种想法,与进入新世纪以来所有现代学科内出现的就学科性质而开展“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的潮流相吻合(Baker 2001: 10)。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总的学术研究走向。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被称为是一门与上述学科有交叉研究内容的“跨学科”。事实上,现代翻译研究在建立伊始,已有研究者指出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潜力就在于其能够“在各门已确立的学科及新发展的学科中建立一接触点”(Steiner 1975: 238)。但随着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亦有学者担心,过分强调翻译的跨学科特征容易让翻译研究成为一门无学科特征的研究领域。如 Snell-Horny 所言,“跨学科并不构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反,它只是不同学科可以进入的公开领域。换言之,严格而言,‘跨学科’就是‘无学科’状态”(2006: 71)。从这个角度来看, Chesterman 和 Arrojo 提出的这些“共识”确实煞费苦心,他们所做的这番确定翻译研究版图的努力也值得肯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共识”的认可度有多大?即便大部分学者接受这些“共识”,翻译学科拥有了自己研究的一亩三分地,翻译研究就能得到比如今更健康、更快速的发展吗?而翻译研究具有“跨学科”特征就等同于

“无学科”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相信读者可以看出,现阶段我们取得的对翻译研究唯一的“共识”就是翻译研究没有“共识”。我们不排除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久的时间之后,当翻译研究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之后,我们在某些经过反复讨论的论题上面可能会有初步的一致意见;但在目前,翻译研究的发展仍未达到一个比较成体系、能够完全独立于学科之林的阶段,在这阶段提出任何的所谓“共识”都为时尚早,容易片面化和极端化。

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现代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勃兴以来,至今也只不过三十余年的历史。相比于其它根深蒂固、历史悠久的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过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过早的设立一些学科的“共识”有些画地为牢,为学科的发展设置人为的桎梏。更为不利的是,这些“共识”容易给翻译研究的学生或是将来的研究者以一种“金科玉律”的印象,间接地打击他们挑战一些所谓“权威观点”的勇气,扼杀使翻译研究多元化的不同声音,且会人为地造成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虽然Chesterman和Arrojo对这些“共识”的本意可能主要是持“描述性”的态度,但当这些“共识”得到学科内的公认时,很可能会具有“规定性”的效果,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众多翻译研究者内心具有约束作用的参照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每一次比较重大的发展,基本上是在颠覆先前的所谓“共识”的基础上而来的。例如,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突飞猛进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以描述翻译学为首的一批学者对长期视为圭臬的观点——翻译即为寻求两种语言之间的“等值”——的颠覆。而James Holmes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翻译研究蓝图,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被许多翻译学者(尤其是Toury)奉为经典。但这幅蓝图在当今百花齐放的各种翻译流派、各种不同的研究翻译角度(如后结构主义、认知、社会学、跨文化交际学等)面前已显苍白。新的更具包容性、更能反映当今翻译研究现状的翻译蓝图正在酝酿之中(参阅Gile 2001: 149)。

以上说明,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而言,某一阶段起到促进学科发展的“共识”在后期反而可能会成为学科发展的障碍。“共识”只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永恒不变。从这一点看来,Chesterman和Arrojo的建构翻译研究“共识”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可能有论者认为,以上观点过分强调不确定性,容易坠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但笔者认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的魅力就在于其拥有比其它硬科学(hard science)更多的弹性。前者研究范围没有后者那么多条条框框,研究内容、论证过程亦比后者更为灵活,更显得天马行空,而研究结论亦比后者更具柔性。只要研究者能在研究过程中自圆其说,那其研究结果就一定有可观之处,能丰富我们对翻译对象的认识。人文研究方法和硬

科学研究方法同属于人类研究(research)所用的种种方法的一种,因为从广义上而言,研究即为“旨在扩大知识总量的一种系统的考察活动”(Chambers 1989: 845)。因此,我们如能在翻译研究中摒弃对“共识”的追求,抛掉模仿硬科学般寻求(唯一)正确答案的想法,那么在研究时定能消解翻译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翻译研究各个流派之间人为确定的边界,拓展更广阔的学科研究空间。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复杂性了解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地借鉴不同学科的角度来审视本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以期消除传统视角导致的在理论或现象方面的盲点。此外,研究者不再受制于学科中原有的“各种范畴和僵化的区分”(Baker 2001: 17)亦是跨学科研究盛行的另一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学科借鉴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不可逆转的主流现象。从跨学科角度来探讨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的成果数不胜数。例如,Hansen(2004)编辑的论文集专门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不同的跨学科视角给语法教学、语言学研究、二语习得和叙事研究等领域带来的新发现。另外,我们还可见到跨学科视角的文学研究(Sell et al 1994)、语用学研究(Blommaert et al 1998)、文化研究(Herbrechter 2002)、认知语言学研究(Ibanez et al, 2006)等,甚至还可见专门研究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著作(Klein 1990)。对此,Baker正确地指出,跨学科特点不仅广泛地存在于新兴学科或人文科学研究,亦见于自然科学研究。正如当今没有完全不借鉴其它学科而存在的“纯”语言学研究、“纯”社会学研究或“纯”化学研究一样,不借鉴其它学科的“纯”翻译研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 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The pragmatics of cross-cultural contact and some false dichotom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Maeve Olohan (ed) *CTIS Occasional Papers* (Volume 1) [C].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1: 7-20.
- [2] Bell, T. Roger. An applied linguist wonders about boundaries round the newly cleared field [J]. *Target*, 2001(1): 149-168.
- [3] Blommaert, Jan and Jef Verschuereen. *Debating Diversity: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Tolerance*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4] Chesterman, A. & R. Arrojo. Shared groun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arget*, 2000(1): 151-60.
- [5] Davidson, George W., M. A. Seaton and J. Simpson (eds). *Chambers Concise Dictionary* [Z]. Chambers: Cambridge, 1989.
- [6] Gentzler, Edwin. Expanding horizons or limiting growth? [J]. *Target*, 2001(1): 160-65.
- [7] Gile, Daniel. Being constructive about shared ground [J]. *Target*, 2001(1): 149-53.
- [8] Halverson, Sandra. The fault line in our common ground [J]. *Target*, 2000(2): 356-62.
- [9] Hansen, Hans Lauge. *Disciplines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C]. Copenhagen: Museum Tusulanum Press, 2004.
- [10] Herbrechter, Stefan. *Cultur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ransla-*

- tion [C]. Amsterdam: Rodopi, 2002.
- [11] Ibanez, Francisco J. Ruiz de Mendoza and M. Sandra Peña Cervel.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6.
- [12] Klein, Julie Thompson.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C].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3] Malmkjar, Kristen. Relative stability and stable relativity [J]. *Target*, 2000(2): 341-45.
- [14] Mossop, Brian. Why should we seek common ground [J]. *Target*, 2001(1): 158-60.
- [15] Olohan, Maeve.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16] Pym, Anthony. Why common ground is not automatically space for co-operation: On Chesterman versus Arrojo [J]. *Target*, 2000(2): 334-37.
- [17] Sela-Sheffy, Rakefet. The suspended potential of culture research in TS [J]. *Target*, 2000(2): 345-55.
- [18] Sell, Roger D. & Peter Verdonk. *Literature and the New Interdisciplinarity* [C]. Amsterdam: Rodopi, 1994.
- [19] Shlesinger, Miriam. Shared ground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too [J]. *Target*, 2001(1): 165-68.
- [20] Simeoni, Daniel. When in doubt, contextualize... [J]. *Target*, 2000(2): 337-41.
- [21] Snell-Hornb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22] Sonja Tirkkonen-Condit, Jukka, Mäkisalo, Riitta Jääskeläinen, Mirja Kalasniemi and Pekka Kujamäki. Do we need a shared ground? [J]. *Target*, 2001(2): 339-43.
- [23]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4] Tennent, Martha. *Train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25] 黄立波. 翻译研究的文体学视角探索 [J]. 外语教学, 2009(5): 104-108.
-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Translating Hybrid Texts in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an Koon Chung's Fiction”(批准号 G-U78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 邓海丽,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兴趣: 翻译研究。  
李德超,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 博士, 研究兴趣: 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 2010-12-29  
责任编辑 王和平

(上接第 65 页)

### 参考文献

- [1] Brennan, R. L. Applications of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A]. In Berk, R. A. (ed.). *Criterion-referenced Measurement: The State of the Art* [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 Brennan, R. L.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M]. New York: Springer, 2001.
- [3] Brown, J. D. & Bailey, K. M. A categorical instrument for scoring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skills [J]. *Language Learning*, 1984, 34(1): 21-42.
- [4] Cronbach, L. J., Gleser, G. C., Nanda, H. & Rajaratnam, N. *The Dependability of Behavioral Measurements: Theory of Generalizability for Scores and Profiles* [M]. New York: Wiley, 1972.
- [5] Gebril, A. Score generalizability of academic writing tasks: Does one test method fit it all? [J]. *Language Testing*, 2009, 29(4): 507-531.
- [6] Lee, Y. W. *Dependability of Scores for a New ESL Speaking Test: Evaluating Prototype Tasks* (TOEFL Monograph Series, MS-28) [R].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05.
- [7] Sawaki, Y.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analytic rating scales in speaking assessment: Reporting a score profile and a composite [J]. *Language Testing*, 2007, 24(3): 355-390.
- [8] Shavelson, R. J. & Webb, N. M.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A Primer* [M].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1.
- [9] 教育部. 国家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3-12 年级)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0] 刘远我, 张厚粲. 概化理论在作文评分中的应用研究 [J]. 心理学报, 1998, 30(2): 211-217.
- [11] 罗娟, 肖云南. 基于多元概化理论的英语写作评分误差分析研究 [J]. 中国外语, 2008(5): 61-66.
- [12] 杨志明, 张雷, 马世晔. 从多元概化理论看高考综合能力测试的改进 [J]. 心理学报, 2004, 36(2): 195-200.
- [13] 杨志明, 张雷. 测评的概化理论及其应用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 [14] 张雷, 侯杰泰, 何伟杰, 文剑冰, 王渝光. 普通话测试的录音评分可行性、信度及经济效率 [J]. 心理学报, 2001, 33(2): 97-103.
- [15] 徐建平. 教师胜任力模型与测评研究 [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04.
- [16] 赵向民, 王占礼. 海船船员英语口语评估的概化研究 [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2005, 31(2): 55-58.
- 作者简介: 孙海洋,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系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和语言测试。  
韩宝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言测试和外语教育。

收稿日期 2011-03-12  
责任编辑 秦岭